

FL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 国际文学理论学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 王宁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16



文学
理论
前沿

(第十六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16

主编：王宁



文学
理论
前沿

(第十六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前沿. 第十六辑 / 王宁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6339-9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1628 号

责任编辑：曹诗悦

封面设计：覃一彪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5.2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

定 价：56.00 元

产品编号：073214-01

国际顾问委员会

乔纳森·卡勒

陆贵山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特里·伊格尔顿

J. 希利斯·米勒

吴元迈

胡经之

W. J. T. 米切尔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钱中文

主 编

王 宁

副 主 编

徐 剑 生安锋

编 委

霍米·巴巴

戴维·戴姆拉什

罗 钢

谢少波

马歇尔·布朗

党圣元

陶东风

许 明

曹顺庆

金元浦

王一川

周 宪

陈永国

刘 康

王岳川

朱立元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Jonathan Culler

Lu Guishan

Gayatri Spivak

Terry Eagleton

J. Hillis Miller

Wu Yuanmai

Hu Jingzhi

W. J. T. Mitchell

Fredric Jameson

Qian Zhongwen

EDITOR

Wang Ning

ASSOCIATE EDITORS

Xu Jian Sheng Anfeng

EDITORIAL BOARD

Homi Bhabha

David Damrosch

Luo Gang

Xie Shaobo

Marshall Brown

Dang Shengyuan

Tao Dongfeng

Xu Ming

Cao Shunqing

Jin Yuanpu

Wang Yichuan

Zhou Xian

Chen Yongguo

Liu Kang

Wang Yuechuan

Zhu Liyuan

编者前言

经过三个多月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十六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前几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自2009年起,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聘为讲席教授,因而本刊将由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强强联合吧。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刊自创刊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增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刊已连续三度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前几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又对各种集刊进行了整顿,一些集刊由于各种原因停办,而本刊则得以幸存,而且自2014年起改为半年刊。这些无疑是对本刊的一个极大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有两个:一是站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推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所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的大型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本刊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现在改为每年出版两辑,也许今后会出版三辑或四辑。与国内所有集刊或期刊不同的是,本刊专门刊发20 000~30 000字的、既体现

扎实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 10 篇左右, 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 40 000 字。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 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 希望他们在仔细研究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研读各辑所发论文之后再寄来稿件。本刊每一辑发表境外学者论文 1~2 篇, 视其是否与该辑主题相符。这些论文一般选译自国际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主编拥有这两家刊物的中文版版权), 或主编直接向境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目前每一辑的字数为 200 000 字左右。

本辑中, 第一个栏目依然是过去沿袭下来的主打栏目《前沿理论思潮探讨》。这一栏目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均探讨了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 分别出自一位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 西蒙·埃斯托克的文章试图使生态批评的阐释范围得以普及和拓展, 并在某些方面回应了生态批评所受到的许多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的挑战。他认为, 在环境日趋恶化、危机四伏之情形的推动下, 生态批评深受读者欢迎。在很大程度上, 生态批评坚决否定蒙昧主义, 提倡接触美学, 寻求和支持一种即刻性和直接性。在评述了生态批评本身所遭遇的一些问题后, 作者指出, 生态批评理论应该意识到在其领域内如此丰富的开放性已经使其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 它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抵制那种认为生态批评在其萌芽阶段就已建立起了光明的和令人兴奋的激进主义理论的传统观点。这应该说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生态批评。何辉斌的文章主要介绍并评述了美国学者伊斯特林的认知生态批评及其对当代生态批评的发展和推进。作者认为, 伊斯特林采用了大量的认知科学、进化论的新成果, 使得当代生态批评呈现出新的面貌。伊斯特林不像那些天真的现实主义者那样相信大脑能够毫无偏见地再现外在世界, 也不似强烈的建构主义或激进的怀疑主义者那样把心灵中的再现看作独立于现实的现象, 而是采用辩证的知识论。她将世界置于进化的链条中进行考察, 认为万物彼此有用、相互联系, 破除了自然—文化的二分法。因此, 在作者看来, 认知生态批评认为世界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 不必一味地追求和谐, 一味地指责人这个主体。这些观点无疑有一定的新颖性, 对于以自然和环境为取向的当代生态批评是一个新的发展和推进。

接下来的三篇论文分别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一些当代作家的文学理论思想进行发掘和阐释。凌淑珍的文章聚焦 V. S. 奈保尔的《河湾》, 试图发掘出作品中蕴含的丰富的视觉文化因素, 如民族主义领袖的肖像摄影、全家福、个人生活照及旅游风景照等。她的文章从民族主义领袖肖像照的在场和观看的政治张

力入手，分析了非洲本土知识分子、非洲当地农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她看来，《河湾》中的视觉文化含义折射了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的移民和西方游客等对无根的世界主义的认同和试图弱化民族—国家的企图。在小说的多重主题中，视觉文化的因素以及由此而展现的主题与非洲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均有着紧密的联系。汪小玲的文章则探讨了纳博科夫这位有着多重民族和文化认同的俄裔美国作家的文学理论。她认为，纳博科夫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对美国文化、俄罗斯传统乃至世界文化均作了独特的凝练与杂糅，从而具有普世的意义。她以纳博科夫的文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从其“美国性”和“俄罗斯性”的特点出发，深入探究纳博科夫文论与欧美文学思想和理论思潮的关联。她将研究对象置于世界文论发展的动态语境下，系统地研究了纳博科夫文学思想的“世界性”特点，揭示了纳博科夫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和包容性，并指出，正是纳博科夫作品的“美国性”与“俄罗斯性”的张力使得他本人游离于这两种文化之间，最终探索出自己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自从引进中国来就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迄今研究他的翻译理论者却不是很多，这方面覃学岚的文章弥补了这一缺憾。覃文依据德里达涉及翻译研究的三篇论文对其翻译观进行了阐释和重新解读。他认为德里达主要是从词的多义性和原文中含有外来词这两方面探讨不可译性，其出发点并不是要否认翻译的忠实原则，而是强调翻译的难度；德里达翻译观下的 relevant translation 不仅没有否认忠实原则，而且还对“忠实”做出了新的阐释，并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者还指出了德里达的翻译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逻辑和表述的严谨性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德里达的翻译观并未彻底否定或颠覆传统的翻译概念，而把解构主义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不少学者，尤其是文化学派的学者对德里达的翻译观却在不同程度对之有着曲解。

孙亚鹏的文章也不是专门探讨理论的，而是通过考察北美的中国学研究来发掘其中的理论问题。他认为，北美的中国学研究在 21 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传统汉学领域也走在西方的前列。随着近十几年来新视角、新课题的涌现，文献资源数量的增加，中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对这段时期的学术概况进行回顾并探究其发展趋势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对 21 世纪以来北美中国文学的研究最新进展的梳理，他在文章中介绍了从先秦到现当代各个历史分期中主要学者的重要著作、文章概要和研究范式，并对北美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最新的文学文化史观、华裔学术群体、博士培养和数字化文献资源等情况作了探讨，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追踪和理论分析，总结出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本辑的第二个栏目《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延续了上一辑的栏目设置,仍然编发了三篇理论文章,均是论文作者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张叶鸿的文章考察的是20世纪西方学术语境中有着一脉相承关系的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她认为这三大理论流派均注重主体与世界的交互关系和意向性关联;将文学接受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成为研究文学本体形态和文学接受模式的主要理论来源。接着,她着重梳理了自20世纪20年代起,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先后被引进中国的发展历程,她认为,这种接受经历了从介绍翻译到应用和拓展的过程,逐渐得到广泛的重视,并激发出学者对之持续的研究热情。由于这些理论既渗透到中国的研究实践,更与中国文化传统互释互证,因而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发掘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遗产,从而逐步实现了这些理论的“中国本土化”。都岚岚的文章则着重探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她首先指出,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欧美女性主义文论与性别研究产生于自己的文化语境。在对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文化前提、主要派别、理论特色及其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作了评介之后,作者着重分析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重组和改造,尤其是法国女性书写理论在中国的变异,并且剖析了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困境和出路。作者认为,旅行至中国的欧美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既经历了创造性的阐释,又遭到了文化过滤甚至误读和“畸变”。尤其是女性身体写作的畸变已经与西苏和伊利格雷等女性主义理论家所倡导的以书写女性身体来颠覆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初衷相去甚远。在作者看来,当女性主义旅行到中国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本土实际的文化语境,以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我们研究西方文论应取的正确态度。

和上一辑一样,本辑接下来的一个栏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也选发了两篇论文,均是论文作者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今后我们还要发表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杨林的文章讨论的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被盛赞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重要著作。他认为,该书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矛盾。由于物化现象蔓延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笼罩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卢卡奇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师承韦伯的理性化原则,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物化的深刻矛盾,指出物化操控着人类生产、社会、

文化诸方面，导致了人的异化、陌生化和碎片化。作者总结道，卢卡奇倡导用“总体性”“典型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艺术原则来揭露、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他的文章基于文学艺术的“总体性”“典型论”和“人道主义”这三方面，论证了卢卡奇的文学艺术反物化的思想，阐释了卢卡奇文艺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价值。王柱的文章则着重探讨了新历史主义对莎士比亚研究的指导性意义。在对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莎剧研究做了简略回顾后，作者概括其主要着眼点是从“角色研究”到“形式主义批评”，再到“历史化批评”的数个研究范式的转换；接着重点分析了各自所带来的问题，并讨论了“新历史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应对策略，进而指出这些理论对莎剧研究的推进作用。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还对中国的莎剧研究做了评述，并在与“新历史主义”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指出很多学者仍不愿意做方法论方面的自我反思且对文本读得不够细致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无法进入国际学术主流的原因所在。有鉴于此，作者对中国的莎剧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本刊的编定正值国庆长假来临之际，大家都在忙着新学期开学的工作，我在此谨向为本集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 宁

2016年10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前沿理论思潮探讨

在矛盾的开放性空间构筑理论：生态批评及生态恐惧

..... [加拿大] 西蒙·埃斯托克 1

伊斯特林的认知生态批评.....何辉斌 17

非洲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河湾》的视觉文化透视.....凌淑珍 30

美国性·俄罗斯性·世界性：纳博科夫文学理论研究.....汪小玲 50

对德里达翻译观的重新思考.....章学岚 70

新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趋势（2000—2016）.....孙亚鹏 91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和中国阐释理论构建.....张叶鸿 126

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及其本土的女性批评.....都岚岚 150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

卢卡奇的文艺思想研究：文学艺术的反物化性.....杨 林 177

新历史主义与中国的莎士比亚剧作研究.....王 柱 203



CONTENTS

Editor's Note

Exploring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Trends

[Canada] Simon Estok

Theorizing in a Space of Ambivalent Openness: Ecocriticism and Ecophobia 1

He Huibin

On Easterlin's Cognitive Ecocriticism 17

Ling Shuzhen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Africa: Exploring *A Bend in the River*
from a Visual Cultural Perspective 30

Wang Xiaoling

Americanness, Russianness, and Cosmopolitanism: A Study of Nabokov's Literary Theory 50

Qin Xuelan

A Rethink of Jacques Derrida's Notion on Translation 70

Sun Yapeng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from 2000 to 2016
—An Overview and Future Trends 91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in China

Zhang Yehong

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Theory 126

Du Lanlan

Feminism, Gender Stud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eminist Criticism 150

Studies of Marxism and World Literature

Yang Lin

A Study of Georg Lukács's Literary Thoughts: On Anti-Reific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177

Wang Zhu

New Historicism and China's Shakespeare Studies 203

在矛盾的开放性空间构筑理论：

生态批评及生态恐惧

[加拿大] 西蒙·埃斯托克

使生态批评阐释范围得以普及和拓展的因素，在某些方面似乎也使生态批评免受许多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挑战。在环境日趋恶化、危机四伏之情形的推动下，生态批评深受读者广泛而热情的欢迎。它坚决否定蒙昧主义，提倡接触美学，寻求和支持一种即刻性和直接性。这种新学说令人目眩，但在总体上又不是很见成效。^[1] 尽管它的内部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但其批评空间仍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2] 在此空间 [彼得·魁格利 (Peter Quigley) 称之为“危险空间”] 里去建构理论是有一点冒险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威胁到生态批评群体内部的平静。泰瑞·吉福德 (Terry Gifford) 曾敏锐地指出，“生态批评之所以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理论争鸣是因为缺乏一种方法论的引导”^[3]。也许他是正确的。目前虽有很多不满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常常被正统的生态批评体系所忽略或根本得不到机会去阐述。^{[4][5]} 其实，越是谈论自然，我们就越能清晰地认识到：生态批评不仅需要能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的领域，还需要更多明确的结构体系、批评方法和可行的术语；越是谈论自然，我们就越清晰地认识到：有必要讨论“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蔑视自然”这个可界定和可辨认的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生态恐惧”，这一术语在一个

[1] 约翰·陶玛哲 (John Tallmadge) 和已故的亨利·哈里顿 (Henry Harrington) 极其简洁地警告说，要注意那些已变得“晦涩和特异的”理论，而劳伦斯·布伊尔 (Lawrence Buell) 所担心的则是他所称作“文学理论所引起的催眠状态”。

[2] 我从瑟皮尔·奥珀门 (Serpil Oppermann) 颇有争议的《将生态批评理论化》一文中获取了“矛盾的开放性”这一术语。

[3] Terry Gifford, “Recent Critiques of Ecocriticism”, *New Formations: A Journal of Culture/Theory/Politics*, 64 (Spring 2008), p. 15.

[4] 劳伦斯·布伊尔也尖锐地指出，生态批评缺乏一种方法论。他在 1999 年声称生态批评没有“像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Said) 的《东方主义》(对殖民话语的研究) 或史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新历史主义的研究) 一样有典范式的开山之作”。

[5] 当然，对生态批评内部没有论战的观点并不是受到一致认可的。早在 1997 年，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上，詹妮弗·瓦伦斯 (Jennifer Wallace) 就评论说，生态批评“已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术争论”。在此，瓦伦斯指的是艾伦·刘 (Alan Liu) 的评论“没有自然，只有历史”的挑战，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此所关注的，部分是因为刘在很多方面所提出的有关认可和理论化的质疑，生态批评迄今为止还没有做出回答。

博客中提早地被称作“范例”)。^[6]在生态批评家中不乏矛盾和冲突,把“生态恐惧”理论化应该不会加深其矛盾,反而会带来各种理论的相互融合,从而实现一些生态批评家所追求的对于生态批评进行某种方法论或理论体系的确定。

生态批评内部的相对平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因为学术理论的争鸣在学术界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则,无一例外。吉福德曾指出:自1995年在福特考林斯举办的第一届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ASLE)会议后的十年内,生态批评一直“缺乏一种激烈的内部争论”。^[7]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事实上,争论已经产生了。一方面,学者们希望与其“和睦相处”,看到了“接触联系”的重要性,^[8]认识到了此时此刻的紧迫性,以及“对于真实之复兴”^[9]的必要性。学者们希望避开对生态批评具体含义的争论去从事生态批评,^[10]幻想“逃脱在当今文学理论形成过程中那种令人痛苦的、内行才懂的抽象”,^[11]想要免除格林·洛夫(Glen Love)所担心的“后结构虚无主义”的影响。^[12]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一个在生态批评内部抵抗理论的历史,一个齐声唱赞歌的生态批评的历史,^[13]庇护着“一些摇摇欲坠的传统”。^[14]常被人看作态度蛮横的达纳·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最近声称,对于理论的抵制“使生态批评家在其学术同行中处于理论和哲学的边缘”。^[15]

菲利普斯并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另一位学者苏西·欧伯瑞(Susie O'Brien)也认为,相对于后殖民理论所做的努力,生态批评并没有考虑到文学模仿能力所带来的幻

[6] 参见 Kit Stolz, “Ecophobia: A Paradigm”, *A Change in the Wind*, 25 (November 2005), http://achangeinthewind.typepad.com/achangeinthewind/2005/11/ecophobia_a_par.html.

[7] Terry Gifford, “Recent Critiques of Ecocriticism”, *New Formations: A Journal of Culture/Theory/Politics*, 64 (Spring 2008), p. 15.

[8] 目前的书,如安妮·麦瑞尔·英格拉姆(Annie Merrill Ingram)等编撰的《形成接触:生态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反映了接触的愿望。

[9] “真实之复兴”这一短语来自查琳·斯普瑞特纳克(Charlene Spretnak)1999年出版的著作标题《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

[10]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p. 3.

[11] Karl Kroeber,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

[12] Glen A. Love, “Revaluing Nature: Toward an Ecological Criticism”, in Chery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236.

[13] Michael P. Cohen, “Blues in the Green: Ecocriticism under Critique”, *Environmental History*, 9.1 (January 2004), p. 20.

[14] Dana Phillips, *The Truth of Ecology: Natur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ix.

[15] Dana Phillips, “Ecocriticism, Ecopoetics, and a Creed Outworn”, *New Formations: A Journal of Culture/Theory/Politics*, 64 (Spring 2008), p. 38.

想的危险性。她的思考值得在此详尽引述，因为她告诉我们：自己与一些学术同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凭借了后结构主义的洞察力，后殖民理论已经通过对存在于所有公认的代表性文本之间以及存在于其内部固有矛盾的强调，削弱了殖民主义的文化根基，从而指出了遵守任何一个声称自己能清晰地反映世界的文化结构理论（包括后殖民主义和生态学）的行为都是危险的。^[16]

我们感到惊讶：为什么生态批评放弃学术争鸣的挑战？当有人声称“自然，和我们所谈论的别的事物一样，首先是一种语言的假象[……]它绝不是直接和表面的含义”^[17]时，生态批评并没有做出回应。艾伦·刘（Alan Liu）在1993年提出的著名的（抑或是臭名昭著的）评论“没有自然，只有历史”，引起了轩然大波，可也只是对于内尔·艾文登（Neil Evernden）一年前的评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自然’，从来就没有”^[18]的响应罢了。毫无疑问，彼得·魁格利有理由在1999年声称，“对于后结构主义的挑战，美国环境研究学界的反应并不能令人满意。在后结构主义之后，我们不可能只考虑像‘自然’这样术语的表面价值；不可能看不到有关这个术语纵横交错的矛盾的裂痕以及历史性的错误论断”。^[19]这些论调继续存在，但我怀疑生态批评对于理论抵制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如瑟皮尔·奥珀门（Serpil Oppermann）所说的“担心落入对自然纯粹的文本主义研究和形成建构一个阐释模板，从而偏离对文学中所强调的环境问题的探讨”^[20]，而是由于为了回避激进主义这个棘手的话题。这样也就引发了生态批评本身的一个基本问题——激进主义的动机及倾向。

生态批评将自身塑造为激进主义。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文学与环境项目的成员评论道：“至少许多生态批评家认为自己是环境激进主义者。”正是这种激进主义的倾向使得生态批评话语呈现出一种刻不容缓性及接触美学的特点；正是激进主义的冲动赋予我们的言语以紧迫感，为我们的聚会增添风采；也正是激进者的雄心壮志将我们与那些当世界慢慢走向末日却还整日古板地陷于无用沉思中的专题研究者们区别开来。像许多早

[16] Susie O'Brien, "'Back to the World': Reading Ecocriticism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in Helen Tiffin ed., *Five Emus to the King of Siam: Environment and Empire*, New York: Rodopi, 2007, p. 194.

[17] William Chaloupka and R. McGregor Cawley, "The Great Wild Hope: Nature,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Open Secret", in Jane Bennett and William Chaloupka ed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Languag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5.

[18] Neil Evernden, *The Social Creation of Na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9.

[19] Peter Quigley, "Nature as Dangerous Space", in Éric Darier ed., *Dis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182.

[20] Serpil Oppermann, "Theorizing Ecocriticism: Toward a Postmodern Ecocritical Practice", *ISLE*, Vol. 13, No. 2 (Summer 2006), p. 115.

先的“政治”理论一样,生态批评在其萌芽阶段是激进的,但现在却似乎发展成了别的事物。早期生态批评的开放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变得喜忧参半:尽管这种开放性帮助其在学术界立足或获得可信度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导致了生态批评在“做什么”或“要做什么”方面的不确定性。借用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有意破坏帮》(*The Monkey Wrench Gang*)中撒维斯博士的一句话,“我们将边走边将其全部解决”。在此,边界似乎模糊了。可以肯定,如果说生态批评已经开始走向没落的话,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能充分将自身理论化;二是不能遵循最初的激进主义抱负。正如朗斯·纽曼(Lance Newman)所指出的:生态批评在“改变社会的理想化理论和研究文学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21]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没能成功地处理生态批评激进主义的难题。这对于生态批评的领域与环境都不是一个吉兆。我们被错觉所蒙蔽,认为:理论与实践是相冲突的;理论不会带来公共政策的改变,而且对于“现实世界”来说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哲学家们早已将棘手的问题理论化,早已设法解决道德责任及自然环境的问题,然而一些20世纪后期的哲学论断——尽管远没有摆脱实用主义及激进主义的影响,却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关于将道德责任延伸到动物界的论著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大公司经营业务的方式。辛格正确地指出,虽然“有些人对道德论辩对于实际生活的影响表示怀疑”^[22],但事实上哲学家们确实有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动物权利运动的推波助澜者”^[23],“出于对动物公共利益[……]的关心,整个工业都正在经历一场变革”^[24]。美容业寻找其他的替代品来代替动物做试验,公众对于毛皮的需求大幅度锐减。特别是工厂化饲养的问题,已从一开始的被边缘化,被看作是疯狂的想法而不置可否,变成在北美和欧洲受到大众关注的中心问题。这些都已成为普遍现象。

利用动物的工业企业是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辛格这种激进思想的影响恐怕要高过所有的生态批评家。他为建立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商业以及消费主义伦理观铺平了道路。最重要的是,他使得对道德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范围内,因而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制定。辛格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他系统地定义阐述了“物种歧视”——对于“本物种中成员利益的袒护,以及对其他物种成员的歧

[21] Lance Newman, "Marxism and Ecocriticism", *ISLE*, Vol. 9, No. 2 (Summer 2002), p. 14.

[22] Peter Singer, *Ethics and Animals*, Korea Press Foundation Seminar Series, Keimyung University, Seongseo Campus, Taejon, South Kore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y 18, 2007, p. 12.

[23] James Jasper and Dorothy Nelkin, *The Animal Rights Crusade: The Growth of a Moral Prot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 90.

[24] Peter Singer, *Ethics and Animals*, Korea Press Foundation Seminar Series, Keimyung University, Seongseo Campus, Taejon, South Kore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y 18, 2007, p. 16.

视”，^[25]但他对道德考虑的延伸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论的偏见。他将知觉力作为评价的界限，而这一界限是在逐渐复杂的有机体系的等级制度之内的，是“从植物到动物，[……]从神经中枢到大脑，从知觉能力到自我意识的”，^[26]是以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为利益的。

然而，我们现在有关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在某些方面似乎有些离题（或许它甚至不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因为如不能合理地保护自然环境势必会引起人类的灾难，因此，也就意味着“即使在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框架内，对于环境的保护也可能是最具有重要价值的事”。^[27]然而，以这样一种方式引证辛格并不意味着接受他将承受痛苦和知觉能力作为检验伦理道德标准的信条。事实上，辛格的实用主义倾向将发展环境伦理排除在外，因为它所依赖的恰恰是首先会产生问题的理论——一种不可靠的对生命等级的伦理认同——将知觉能力高的生命形式置于伦理关怀的顶端，知觉能力不发达的置于伦理关怀的底端，而缺乏知觉能力的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实用主义哲学通常有这样的缺点：对于欲望或认识到的需求的满足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将这些置于伦理系统的核心势必将没有知觉能力的实际存在物排除在伦理关怀的范畴之外。毫无疑问，辛格所声称的“需要……新的道德标准”^[28]是对的，但让他提供抑或甚至接受这样一种道德标准却是不可能的。其实，辛格关于环境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29]的论证是合理的。但是生态批评家们及环境学家们经常对此观点予以忽视。

2007年春，我有幸见到辛格并与他谈到了这个问题：目前普遍存在着缺乏足够的词汇来描述人类对自然环境偏见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需要。然而，他当时的回答以及后来在我们邮件交流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令人失望的。他认为“不太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认为需要把对自然环境作用感到恐惧和蔑视的这种想法理论化。^[30]

如果生态批评承诺建立联系，那么它也将承认：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在西方文化中被看作上帝赋予的一项权利，意味着生态恐惧。正如使用非洲奴隶意味着种族主义，强

[25]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New York: Discus, 1975, p. 15.

[26] Holmes Rolston III, "Disvalues in Nature", *The Monist*, 75 (1992), p. 271.

[27] 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8.

[28] *Ibid.*, p. 286.

[29] *Ibid.*, p. 288.

[30] 生态恐惧并不是我们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唯一特点。这还是一个未被涉足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其反义词应是爱德华·O. 威尔森（Edward O. Wilson）所提出的“热爱自然”，即“人类本能地对其他生命有机体有一种亲密的情感”。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也指出，“生态批评其实是由人类亲自然的本能所推动的”。无可否认，热爱自然的确是激发生态批评发展的动力，但它却不是生态批评探究的目标。这种探寻必须在核心内容中包含生态恐惧及其如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中可清楚地看到人类对生态的恐惧最终胜出了对自然的热爱。虽然威尔森的述说雄辩有力，但我们知道物种“快速消失”的主要原因是生态恐惧，绝不是热爱自然。

奸罪意味着对女人的厌恶,“对同性恋使用暴力”则意味着对同性恋的厌恶和恐惧,对动物的剥削意味着物种歧视。如果生态批评致力于建立联系,那么它也将承认这些问题(生态恐惧、种族主义、厌恶女人、对同性恋的厌恶和恐惧以及物种歧视)都完全地交织在一起,最终必须被一起看待。

然而,将“生态恐惧”这个术语理论化意味着要审视它在历史上的建构时刻。即它给予我们圣经般的指令来控制所有活着的一切。当然,“控制”在此是关键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我们越是对自然环境有更多的控制,其实我们就越没有控制力。正如内尔·勒威(Neil Levy)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没有掌控非人类世界,因为无法准确地预测我们的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31],而且这种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激烈和不可预测,不过反过来却产生了可以预料到的有关生态恐惧修辞的大量涌现。

对于生态恐惧这一术语,生态批评需要非常广阔的范围。临床心理学用同样的术语来指对家的毫无理由的恐惧。在生态批评中,这一术语是独立的,并非由心理学及精神病学中的方法导出。^[32]生态恐惧是一种非理性的和无根据的对于自然界的憎恨,就像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厌恶、种族主义及性别歧视主义一样,微妙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它发生在许多领域:它支持了个人卫生以及美容业的发展(这些行业把自然的“不足”与“缺点”列为他们工作的目标);它支持有权负责罚款的城市公共卫生委员会,在市政思想指导下清除害虫和杂草;它维持了美容师和理发师行业的发展;它隐藏于美丽的花园和首尔地铁上女士手提包中修剪得体的卷毛狗里。生态恐惧有关权力和控制,意味着对动物和非动物资源可能的掠夺。同样地,自我饥饿与自我毁伤也意味着生态恐惧,这与处死黑人的私刑意味着种族歧视没什么区别。

在哲学基础上细化生态恐惧是一件重要而又艰难的工作。以对生态批评有意义但又在哲学上不显得幼稚的方式将生态恐惧理论化,意味着对有害/讨厌问题的处理。令人惊奇的是,在生态批评的讨论中,此项研究进行得甚少。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他所提出的令人赞赏的“大地伦理学”中,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将伦理道德的关怀扩展到整个大地。他声称,“当一个事物倾向于保持整个生态群落的美丽、完

[31] Neil Levy, “Foucault’s Unnatural Ecology”, in Éric Darier ed., *Dis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210.

[32] 罗伯特·凡·泰恩(Robert Van Tine)提出了类似的术语“盖亚恐惧”(Galeophobia, 一种对自然进行极度破坏的疯狂形式,并对破坏性的行为后果加以病态的否认。<http://www.ecopsychology.org/journal/gatherings2/robin.htm>)。虽然根据《神经错乱诊断及统计指南》所列的病理学症状来确认其对自然环境的态度(有时候相当机械)具有潜在的有用性,但从泰恩的文章来看似乎夭折了,在任何我能找到的学术著作中都没有对此提及。虽然有些令人沮丧,但其学术成就还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了我在此探讨的理论性阐述已经在生态心理学领域被看作是必要的。我的方法是交汇的:在不放弃对蔑视自然环境的病态行为进行生态心理分析的前提下,更偏重哲学层面上的探讨。